

※日本考證學研究專輯※

大田錦城的尚書學(二)

石田公道著 連清吉*譯

一、考證學與錦城

「考證學」作為學派的名稱而為一般所使用始於清朝。大田錦城被今日學界定位為我國考證學的先驅，則錦城於考證學的研究成果究竟為何，誠值得探究。

被稱為考證學的清儒經解之舶來傳入我國，是在元祿時代。唯當時輸入的數量寥寥無幾，而且大部分都收入各藩的藩校或文庫，個人能得手收藏的是極其困難，即使可能，也甚為稀少。故以清儒經解而活用於中國古典注釋研究的人是極為有限，甚至可以說是接近無的。

清儒經解之逐漸為一般學者所得手繙閱的是在安永、天明年間，換句話說，清朝考證之影響我國學界也在此時。

據《慊堂日曆》（松崎慊堂於文政六年至弘化元年的日記）天保六年五月端午的記載：在狩谷掖齋的協助下，以六十五兩購得阮元所編《皇清經解》六十帙。天保六年即錦城死後十一年，故錦城即使能入手清儒著作，當為清朝中葉以前之學者的著作。

《九經談》總論經學三變曰：「清人有為漢學者焉，有為宋學者焉，有混漢、宋之學而自為一家者焉。然要皆清學，而其所長則考證也。」即錦城以為無論清人治宋學或漢學，清儒學問的特色乃在於考證。錦城又說：

聖人沒二千年，其遺意唯在言語文辭之間。故不精字句，則不能知聖人之妙意也。治考證之學，是清人之所長也。……得明人之書百卷，不如清人之書一卷也。（《九經談》，卷一）

* 連清吉，長崎大學環境科學部文化環境講座副教授。

對清儒精密考證極其推崇。唯錦城並非盲目地稱揚清人的學問，亦有批評其缺失的所在。錦城說：

自朱彝尊、毛奇齡以至近世諸家，雖有異同，要皆考證之學也。其中冰炭相攻，得失互有，然精密纖細，古今之所無，是其學之所長也。唯其學過精細，而無一人發大見識，以道自任者，是其學之所短也。（《九經談》，卷一）

清儒的學問於字句訓解上雖有極大的貢獻，但是於具備見識掌握大局以體現道德上，則付諸闕如。清儒學問之所長確實只在於考證，唯學者不能不以道自任的責求，則未脫宋儒義理的窠臼。

錦城以為清人考證之學或有淆亂義理本旨的所在。錦城批評清人學問說：

近世清人考據之學行焉。人好癩祭，學問之博，過絕前古。然不論義理當否，而唯欲援據之多。書名人名充牣卷帙，而義理之學荒矣，予名之曰書肆學焉。（《九經談》，卷一）

錦城以學問而窮究義理為根本，考證則為末節。亦即考證只是究極義理之精微的手段。考證精密而與義理乖違亦無甚大的意義。此誠為至極至當的論述。唯今日而觀錦城的著書，仍不免有偏向考證訓解而少義理探究的缺失。

雖然如此，錦城指陳當時考證弊端的議論，誠值得留意。錦城說：

且也考據之學，其所費精，則在瑣義末理，而聖道大原，則措而不講。是亦近世學者之弊也。（《九經談》，卷一）

考證之學雖有所長，亦有所短的見識，誠知人之言。

二、錦城的學風

錦城於《梧窗漫筆三編》中，敘述其自身的學問說：

吾家法者，漢傳唐疏、宋元注疏、明清著錄。不以愛憎為取捨，務以公平之心折衷諸說。猶心有不慊處，則精思考覈而期至當。門戶爭軋之意，誓於神明而不為。

可知錦城乃以折衷學自任。雖然，於實際訓解時，則非有所據不可。錦城所據者非新注，而是以漢、魏傳注為中心，此一傾向是與清朝學者相同的。至於博引群書而參酌百家之說的取徑，亦同於清儒的治學方法，此錦城所以被稱為考證學家的主要原因。

錦城對考證學所抱持的見解既已敘述及之，茲更求其注釋《尚書》的態度。《九經談》卷五記述著：

予作《大疏》，以古注爲主。古注所不通，則以朱注補之。朱注所不通，則以明、清諸家之說補之。諸家所不通，則以一得之愚補之。

《大疏》者，錦城所著之《論語大疏》。錦城注釋《論語》乃以漢、魏古注爲主而兼採朱注。清朝學者則極盡可能地以古注爲主而不採朱注，錦城的注釋旨趣與清儒有如此的不同。

不但《論語》的注釋如此，《尚書》的訓解亦然。錦城以孔《傳》爲中心而注釋《尚書》，由其晚年講述的《尚書紀聞》可以窺知其全貌。探究《尚書紀聞》的內容，可知錦城乃以《十三經注疏》本《尚書》爲底本，於注釋，則以孔《傳》爲本而論古注是非得失者居多。孔《傳》有所不通，則以宋、元、明學者之說論之。至於清儒之說的引用則極少。現行《尚書紀聞》雖未附載孔《傳》，然讀者若不參照孔《傳》而欲解明錦城所說的究竟，是極爲困難的。

錦城雖極力辨駁《僞古文尚書》，於《僞古文尚書》的注釋亦不懈怠。當時批駁《僞古文尚書》者只取今文二十九篇而注解之，至於僞古文經則棄之不顧，但是錦城以爲僞古文亦有《尚書》的逸文，不可輕易廢棄。錦城說：

予故言安國之增多雖在今日，恐不如今之增多，古書、逸句、聖謨、嘉言全然具備。此豈可廢耶。（《梅本增多原》）

清王先謙著《尚書孔傳參正》以爲《尚書》雖是僞古文，亦爲諸家必讀之書而不可廢。真僞並存而詳審注釋的旨趣，錦城與王先謙是相同的。換句話說，真僞之論與有用無用的性質是有所差異的，可辨者宜辨明，可學者宜勤學。

一般學者將大田錦城定位爲考證學家，現行的《日本儒學史》也大抵歸屬之於考證學派。然則檢尋其注釋，既無引用清朝考證學家之說，亦無推崇清儒之辭。其晚年講述的《尚書紀聞》雖列舉清儒顧炎武、胡渭、毛奇齡、朱彝尊、萬斯大、閻若璩、王鳴盛、徐乾學、杭世駿、惠士奇、沈彤、全祖望等人之說。唯清儒所說的引述，殆於〈舜典〉而已，而且不是注釋的引用，只是說明經文真僞時，人名的列舉而已。

《尚書紀聞》所列舉的清儒，大抵是清朝前期的考證學家，至清朝考證學之代表學者惠棟，錦城不但未有推崇，反批評之爲：

近世清人之漢學，誠無用之學也。自余蕭客《古經解鈎沈》、惠棟《九經古

義》、《易漢學》之類，一無所用。《尚書集注》、《尚書後案》皆同。江永、惠士奇、錢大昕、王鳴盛之徒皆然。（《梧窗漫筆》）

此論述雖非竟讀清儒全部著作後的評語，其於清朝學者之考證未必稱揚的態度，蓋可窺知一二。文中所謂《尚書集注》是指江聲的《尚書集注音疏》。

錦城以爲清朝考證學家的學問未出書籍的辨正與字義的考校，於學問道理的本義，殆近於無知而嚴厲批判。錦城於清儒品隲之辭，固可見當時一流學者的自信洋溢；然則不免縱情激烈，有失儒者謙恭溫厚的風範。由此觀之，錦城的學問不屬考證學的範疇，定位爲折衷學者，或較爲妥當。

三、錦城的《偽古文尚書》論

當時日本學界對《尚書》的關心，是在於東晉出現的《古文尚書》的真偽問題。關於《古文尚書》的真偽，孔穎達的《尚書正義》既有存疑，日本學界持疑者必不少。唯時尚以古典爲神聖，故未有學者精密分析而證明其偽托的。相反地，如錦城之師山本北山著述《古文尚書勤王師》。

然而錦城則不遺餘力地駁擊古文經傳，綜輯前人所說，並加上己見，以證明古文經傳乃後人之偽托。其堅信古文經傳爲偽，而不惜與人抗顏論辨，即使是交誼深厚的吉田篁墩，亦反覆論辨。東條耕所撰〈吉田篁墩傳〉曰：「蓋宋、元以迄明、清，疑《尚書》者尤多，篁墩禦侮之。」錦城《九經談》曰：「先與亡友篁墩吉學士論此義，反覆爭辨。學生敢不然予之言。」二人各執己見以激烈論爭之事，可以想見。

錦城著述《壁經辨正》十二卷，論證古文經傳爲偽托，又撰述《梅本增多原》十二卷，探究東晉《古文尚書》字句的典故出處。《壁經辨正》雖不及閻若璩《尚書古文疏證》的精密，次第之整然則有過之。閻氏的《尚書古文疏證》是經歷十八年歲月的研究成果；錦城則未繙閱清儒於《尚書》的論考，於三十五歲完成《壁經辨正》。就此而言，錦城的才識誠值得稱譽。

錦城又於讀毛奇齡《古文尚書冤詞》後，條舉與毛奇齡所說相異之處，逐一加以反駁。

錦城雖然論證《古文尚書》爲偽，然因其爲魏、晉四六文體易讀，且多人事治道切要之論述，宜爲後世的規範而不可輕廢。此與清儒王先謙撰述《尚書孔傳參

正》的旨趣吻合，亦展現錦城之為道學先生的風貌。豬飼敬所品評《九經談》而非難錦城的道學精神，此乃豬飼敬所定位錦城為考證學家而造成顯著矛盾的批評。

錦城堅持東晉古文為偽托的主張。至於偽作者到底為何人。

明梅鷺著《尚書考異》，以東晉出現的二十五篇乃是皇甫謐等人的偽作。於是《古文尚書》為後人偽作說開始被提出，偽作者為誰的論議引起極大的波瀾。

錦城亦論述此事。錦城論斷偽作古文經傳的是王肅的門下。其指摘孔安國《傳》及〈大序〉、《孔叢子》、《孔子家語·後序》有數處相吻合的所在而作此論斷。其要義大約如下。

1. 〈洪範〉「稽疑」的「驛」字，孔《傳》與王肅的注類似。
2. 王肅注《論語》有「巧言無實，令色無質」。〈問命〉「巧言令色，便側媚」的孔《傳》作「令色無質」。則孔《傳》與王肅注完全一致。
3. 王肅於〈堯典〉「曰若稽古」特意與鄭玄對立，結果其解釋與從賈逵、馬融之孔《傳》相同。

又《梧窗漫筆》說：「清人云二十五篇者，王肅、皇甫謐二家之學徒所作。殆為皇甫謐之作，類似于作《帝王世紀》之手法故也。」又錦城漫筆（上野圖書館所藏寫本）又謂梅賾所偽作。

錦城晚年講述的《尚書紀聞》說：「二十五篇者，王肅或皇甫謐之偽作也。……偽書當晉皇甫謐之為，謐多為偽書之人也。」即以皇甫謐為偽古文經傳的作者。

錦城於《古文尚書》作者的論說，雖時而易，似未有一貫不變的主張；然根據晚年的講述，其蓋主張王肅之徒偽作說。

《大學原解》卷下，引《書經·大誓》的「其心休休焉」而注曰：「休休，鄭玄曰：寬容貌。何休曰：美大貌。王肅曰：好善貌。今之偽書傳出于王肅門徒，故曰：休休焉樂善。……」《大學原解》完成於文政四年，是錦城長年積累的力作，亦付梓刊行，可謂錦城頗為自負的代表作之一。是知錦城以為《古文尚書》乃出於王肅門下之手。至於皇甫謐偽作或梅賾偽作說，皆未揭示證據，尚不足以斷定，或錦城博學之餘的一時之說而已。

王肅門下偽作說雖非錦城的創見，然我國《尚書》學界始終對後人偽作說，抱著漠然存疑的態度。錦城的議論或給予當時的學界造成極大的震撼。

四、錦城與清儒的經解

《九經談》卷七末尾記曰：

予於兩漢史考之，而知後漢古文即前漢古文，杜林漆書即安國科斗，賈逵之學即為安國之傳。自以為是獨得之妙，發前人之所未發矣。遂辨毛大可《冤詞》，作《辨正》、《增多原》二書。既而得王鳴盛《尚書後辨》讀之。以兩漢古文為一，正與予見暗合。然似是非其所獨得矣，因考清初諸公書，殊無作此說者。而徐乾學《淡園集》特言孔、杜同學，故作此《小辨》，以乾學為有大功于古今文之義焉。其後得閻若璩《古文疏證》讀之，始知此說自若璩發之。

錦城著《壁經辨正》、《梅本增多原》後，讀王鳴盛的《尚書後辨》，著《梅本增多原小辨》後，讀閻若璩的《尚書古文疏證》。其於字裏行間，頗含藏著自負自得之意氣。雖然，錦城此段敘述，或有疑惑，即不無讀《尚書後辨》而作《壁經辨正》，讀《尚書古文疏證》而撰《梅本增多原》的可能。若然，錦城於《尚書》非凡研究的聲譽，即立時失墜。茲細考其究竟。

豬飼敬所品評《九經談》云：「往年讀北山《笑堂福聚》，有言王鳴盛訟於冥府，乃今始知其毀錦城。」可知當時山本北山在《笑堂福聚》書中詆毀錦城。我未見《笑堂福聚》之書，然據廉義齋《逢言記聞》（收載於關儀一郎《日本儒林叢書續編》）所言：

北山嘗著《笑堂福聚》小說，欲付梓，屬門人朝川善庵書序。善庵讀竟云：先生何著此書而污御名，付梓可止，則此書之拙序可免。北山甚不悅，然則許其所請。遂自序付梓而售。北山呼於支配頭之宅，有宜絕版之傳達。遂絕其版。

《笑堂福聚》者，山本北山月旦當時儒者之書，於當時儒者頗作人身攻擊，其有中傷大田錦城的文字，亦可推察而知。朝川善庵是片山兼山之子，為山本北山得意的弟子，其後繼承北山的學統。由朝川勸諫北山打消出版刊行的意念，以免名聲失墜的敘述，可知《笑堂福聚》是頗為不堪的著述。

茲考察《尚書後案》、《尚書後辨》舶來傳入我國的時間，以論究錦城於《尚書》的著作與清儒經解的關係。上野圖書館所藏《商船載書籍》記載著：

寬政三年辛亥 尚書後案 一部一套
十七史商榷 一部一套

又《舶來書目》記載「辰年」舶來書籍，有：

《四庫全書簡明日錄》

《太平寰宇記》

《春秋大事表》

《咳餘叢考》 二帙

《尚書後案》 四帙

「辰年」或為寬政八年丙辰。《商船載書目》與《舶來書目》乃是當時自中國舶載而來的書籍記錄簿。由於當時輸入外國書籍的數量極少，一般的學者即使要購得其中的一部，也是極為困難的事。

御書物奉行近藤正齋《書籍考》載錄：

《尚書後案》 三十卷 十冊

《尚書後辨》 一卷 二冊

紅葉山文庫亦收藏著此二書，與近藤正齋分別著錄《尚書後案》、《尚書後辨》的情形相同。至於《商船載書目》與《舶來書目》皆無《尚書後辨》的書目，或與《尚書後案》合訂舶來。原本王鳴盛著述《尚書後案》即附錄《尚書後辨》於末尾，一般也視《後辨》為《後案》的一部分，通行的刊本亦將《後辨》附載於《後案》之後，一併刊刻行世。

錦城撰述《壁經辨正》、《梅本增多原》是在寬政十年，晚於《尚書後案》舶來的時間，如此，錦城似無辯護的餘地。然則比較《尚書後案》與《壁經辨正》、《梅本增多原》，論述體例迥異，而且王鳴盛推斷《古文尚書》的二十五篇是皇甫謐所偽作的；《壁經辨正》、《梅本增多原》皆未見皇甫謐之名。錦城晚年著作而謂「或為皇甫謐之偽作」，則早歲未見《尚書後案》、《尚書後辨》而著述《壁經辨正》、《梅本增多原》。

再者，錦城著述此二書的直接動機。此二書以針對毛奇齡《古文尚書冤詞》而論述其見解的居多。錦城雖知王鳴盛《尚書後案》的存在，未必目睹其書。錦城所作「予辨駁《尚書》梅本而著《壁經辨正》、《增多原》二書。後數年得王鳴盛《尚書後辨》讀之，其中往往有與愚見暗合者，此皆予諸友所知也」（《九經談》）的辯解，蓋可採信也。

豬飼敬所於《九經談》的評論中，亦指出：「余亦欲究梅本剽竊之原，聊抄錄古書。近年讀《尚書後辨》，亦多暗合，此事之當然，固不為奇也。」即豬飼敬所

認可錦城的辯解，則錦城未見《尚書後辨》而著《壁經辨正》、《梅本增多原》二書是真實無疑的。山本北山為辯護毛奇齡的《古文尚書冤詞》而著《古文尚書勤王師》三卷，進而非難與所說持相反意見之錦城，與其說是誤解，毋寧說是出自私心的惡言攻訐。

五、《尚書古文疏證》與《梅本增多小辨》

茲探討《尚書古文疏證》與《梅本增多小辨》的問題。錦城謂《梅本增多小辨》之所以撰述的原因是讀《淡園集》而受到啓發。至於讀《尚書古文疏證》是在著述《梅本增多小辨》之後。雖然如此，卻有疑問存在。即錦城謂在讀《尚書古文疏證》之前，似乎不知閻若璩之名；但是王鳴盛《尚書後辨》不但閻若璩之名迭出，閻氏所說亦隨處可見，而且其著《壁經辨正》亦列舉閻若璩及其所著《尚書古文疏證》曰：

閻氏若璩《尚書古文疏證》十卷、姚氏際恒《古文尚書論別僞例》十卷、錢氏惶《壁書辨僞》六卷。右三家皆攷《古文尚書》者也。

其他亦有二處引用閻若璩之說。雖然如此，細究其論述，錦城並非直接引用《尚書古文疏證》，而是轉述朱彝尊《經義考》的載記。即錦城引用《經義考》所載《尚書古文疏證》之說而知閻若璩之名。

如此，問題似在於《九經談》。《九經談》的論說極其簡明而文體齊整。《尚書古文疏證》雖然論述精密而文體雜亂。二書畢竟不甚相似。然而《九經談》第十九、二十、二十一、二十二各條的論述，大抵與《尚書古文疏證》一致，此錦城受到非難的原因所在。雖然如此，錦城似乎蒙受了不白之冤。茲比較其所著《梅本增多原》與《梅本增多小辨》的論述。《梅本增多小辨》條舉論述的，在《梅本增多原》中，皆有詳細的論辨，故錦城要約《梅本增多原》而成《梅本增多小辨》的敘述，到底不是虛偽不實的。

《九經談》一書先有〈總論〉，然後順列《孝經》、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尚書》、《詩》、《春秋左氏》、《周易》，提出各經傳的問題所在而敘述自身的見解。《尚書》列於第七卷，且附載其他各卷所無之副題〈梅本增多小辨〉。此為錦城在撰述《九經談》之前，即著述有《梅本增多小辨》。其論述九經要義時，以《梅本增多小辨》為自身理解《尚書》經義的精要，故收入

《九經談》之中。

《九經談》著述於享和三年。《尚書古文疏證》之傳入，據《商舶載書目》的記載，亦在享和三年。《商舶載書目》著錄：

享和三年亥年 《尚書古文疏證》

《尚書考辨》

《尚書古文疏證》最早傳入之年正與《九經談》著述之年一致。《梅本增多小辨》自然完成於《九經談》撰述的享和三年之前。即錦城在論述《梅本增多小辨》時，並未能睹見《尚書古文疏證》。唯著述《九經談》時，《尚書古文疏證》既已舶載傳來，故錦城於《九經談》卷七（《尚書》）部之末尾作「其書（《尚書古文疏證》）海舶載來最晚」的辨解，以免除誤解。但是錦城銜誇博覽強記，嗜好吹噓其學殖於他人，故招致抄襲閻氏之說的非難與誤解。

六、結 語

寬政以迄文化、文政年間，由《四書》研究進展至《五經》研究的學術趨勢中，大田錦城擅場於學界。當時，學術主導的朱子學逐漸衰微，為挽回此一頹勢，既由各藩拔擢儒者，重建昌平黌，又稱朱子學以外諸學派的學問為異學，彈壓批評朱子學的學者。因此，學界呈現出渾沌不明的現象。

錦城稟賦非凡，博聞彊記，早歲即有大家風範，又蒙知遇擢拔，故能閱覽群書，博綜衆說，發揮經義。

就當時出版界的情形而言，一介書生而欲自由繙閱群書是極為困難的事。錦城獲得當時藏書家多紀桂山的知遇，故得以博覽群經，著書立說，於轉型期的學界，做了極大的貢獻。

錦城於《尚書》研究的領域中，闡明東晉古文及孔《傳》為偽托的考證，是毋庸置疑的。綜輯古今先人之說，解決《古文尚書》真偽問題，則值得推崇。至於進一步地列舉證據提出王肅之徒偽作《古文尚書》的主張，則是其積極性學術性格下的產物。在未接受清儒的影響，而著述《壁經辨正》、《梅本增多原》，可謂我國儒學界非凡成果。唯就其全體著述而言，僅止於該博羅列而缺乏自身獨特的見解。

今日日本儒學史的著述，大抵以大田錦城為考證學的先驅，定位其為考證學的代表學者。但是就其有關《尚書》的著述而言，其學問仍未脫以古注為主，以宋、

元以下學者之說爲輔之折衷學的境域。雖然如此，其著述乃網羅蒐輯古今諸家之說，爲研究經義之罕見文獻書目；但是其著書僅爲一部分圖書館或藏書家所收藏，出版刊行者也只有《九經談》、《梧窗漫筆》等少數書籍而已，殊甚可惜。

——譯自《北海道學藝大學紀要》第 10 卷第 1 號（昭和 40 年 8 月），頁 45-53。